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本文研究的内容、 结构和理论创新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

本文的研究是从制度变迁与人口发展的基本关系入手和展开的。

人口发展指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制度变迁所导致的人口发展类型由低到高的变化过程。各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人口发展类型。现代社会的人口状况可以被表述为现代人口发展类型，因为人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生因素，现代社会这个定义本身已经界定了人口所应具备的现代性质。迄今为止，人口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中人口发展所取得的最高成果。人口现代化并非是一种抽象的目标，而是一种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内涵的实际的社会存在；人口现代化也不是一种静态的人口发展状况，它在现实中的内容和特点只代表一种相对的时代性和价值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将产生相应的变化。

人口发展类型的变化是人口行为变化的结果。但人口行为的变化并非是随意的、无序的，它必然是，而且只能是规范人口行

为的规则发生变化的结果。制度是规范人口行为的规则，因此，制度变迁必然是人口行为变化的先导和内在推动力。人口发展是人类自主追求的目标，其动力来自于特定制度产生的人口发展激励。人口制度变迁同人类的文明起源一样，是接受环境挑战和应战的结果。新的生存机遇、利益和发展机会导致人口行为方式的变化，原有的人口制度均衡被打破，人口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在新的制度关系中被更充分地释放出来，并由此获得在新的社会秩序下的增加了的社会效益。一种预期上更高的制度效率是制度创新主体产生制度供给的动力，因此，不同的社会权利的分配将对制度创新主体产生不同的激励，这一差别导致了人口行为变化的激励机制的根本不同。现实的人口发展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的发展水平，正是人口行为激励机制差别的直接结果。因此，在一种时代背景下，人口制度选择的原则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人口行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被高度激活的个人在社会中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才是现代人口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因此个人在人口制度创新供给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刚性。对人口发展目标，政府强制引入的制度变迁只应被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它的功能和作用主要是为个人的人口行为提供保护和最大限度的利益激励而不是更多。在现代社会，导致人口现代化过程最强的利益激励是市场经济制度，自由竞争市场环境依赖于民主政治的保证，这两方面构成了实现人口现代化的最基本的制度基础。

二、研究的基本方法

在方法上，本文试图以制度变迁理论来构架现代人口发展的动因、关系的分析模型，并把制度变迁与人口发展的相互关系放在有特定历史含义的人类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加以研究。研究方法的理论假设基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然导致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必然导致符合社会需要的新型社会关系的产生，并由此实现

人口行为的现代化，人口行为现代化的积累则构成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发展。

制度在社会现实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制度创新、制度变迁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变中的作用，都足以证明制度变迁理论对现代人口发展应具有合理的解释力。在人类实践中，“任何社会，决不会不与以前的社会和文化再生产制度或控制制度作初步的决裂便发生变化”。^①因此，对制度变迁和人口发展关系的考察属于历史实证法，关于制度变迁和人口发展的理论解释和价值判断的依据，都来自于人类历史的经验基础。正因为如此，制度变迁和人口发展的理论与概念，关系和作用，性质及特征都必须界定在特定的历史范围。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全面社会变迁，既是制度变迁诱致人口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起点，又是我们分析和研究两者相互关系的基本依据。

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必然的社会发展过程，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例外。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必然要发生传统人口发展类型向现代人口发展类型的转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来者未来的景象。”同样，发达国家人口现代化的历史发展道路及所取得的成就，也指明了发展中国家今天和将来的人口发展目标和道路。因此，人口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及已取得的经验对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人口发展都具有普遍意义。

根据上述思想，本文在解释了现代化、制度变迁、技术创新和人口发展的基本概念、理论及相互关系后，提出并建立了“双

^① 阿兰·图雷纳：《现代化与文化特殊性》，载于《国际社会科学》，第7卷，第1期。

中介”因素的制度分析模型，利用制度分析的方法着重探讨了制度变迁与人口发展的相互关系。制度中介因素的分析是全文的重点。论文还对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需求，制度变迁产生的原因、制度创新主体对制度的供给，人口法令、人口行为规则的引入和变化，人口创新技术在人口发展的数量、素质和结构三个方面提供的人口行为转变的技术基础，获得发展的人口关系又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新质要素等等关系的作用和传导机理作了系统的分析。

本文并不满足在一种简单的制度变迁模型中解释现代人口的发展，而是进一步地深入分析国家和个人两种制度创新对人口行为所产生的利益激励机制的本质差别，主要以哈耶克的社会秩序的基本原理为理论依据，构架现代人口发展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①之间相互关联的制度激励机制的基础。利用上述制度分析的方法，本文对我国当代人口发展和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从人口行为的制度创新的供给关系上，对比分析了实践中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各自的功能、作用和产生的实际后果，为认识当代中国人口发展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和视角。

三、理论创新

本文在下述五个方面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意义：

第一，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人口行为和人口发展关系的研究。在我国的人口学研究中，制度因素的研究只是散见于人口变动的非经济因素中，系统地的人口发展关系纳入制度

本文引述的个人主义的概念不是杜威抨击的已经萎缩为“金钱尺度和手段”的、损人利己的旧的个人主义，而是哈耶克所强调的真正的个人主义。真正个人主义下的个人，他是受法律和行为规范约束的自由人；他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热心合作、肯定家庭和小团体共同努力价值的人士；他服从强制，但希望限制它；他坚信他的决策比他人强加的“精密计划”更为现实。

分析框架中，并以制度变迁、制度创新的动态变化来研究人口行为的长期变动的原因尚未见到。

第二，首次提出了人口发展的“双中介”模型，创造性地改进了生育率决定的中介理论，提出了“制度中介”因素，弥补了传统人口理论及方法上的制度分析的缺陷，并把中介理论中决定生育率变动的直接因素定义为“技术中介”，为理解其在人口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新的角度。

第三，在前人提出的人口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人口现代化的内容、特征及价值意义，阐述了人类历史上不同的人口发展类型的分期及其基本的特征。

第四，文中探讨了国家与个人制度创新供给上对人口行为的不同的利益激励机制，认为这是不同的人口发展道路和发展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提出了人口行为制度供给上的配置、功能划分和范围界定问题，以哈耶克社会秩序理论中的个人主义原理为理论依据，对制度创新机制下的个人利益激励机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国家人口制度创新的目标和所应具备的激励机制。这些人口分析方法和理论的提出与运用都具有创新意义。

第五，运用上述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实证分析和研究也具有新颖性。

第二节 研究的背景和选题的意义

一、人类历史进程中人口的自然关系及其意义

人的关系、人的行为是一切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的基点。丹尼尔·贝尔认为，对人类历史的分析，马克思是从人性的双重概

念入手的，他解释道：“首先，有自然人或者普通意义上的人（generic man），他的本质，或种类本性，是生物性的：需要食物、衣服、住房、生殖——即进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再生产。其次是历史人（historic man），他的性质是随机而变的。通过技术，人掌握了自然。在实现这种本领的过程中，在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中，人又获得了新的需要、新的愿望和新的能力。”^① 人类首先必然地以其自然种群的生物性与自然界发生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征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与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② 人类的存在具有自然的属性，但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是人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因此，人不是由自然限定的，而是由人的社会关系发展程度的历史来限定的，历史则是人类发展能力和程度递进水平的记录。人类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西方原发地（马克思认为这是西欧的“历史必然性”^③）到边缘异质文化区广泛扩散的不同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社会获得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能力，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人的自我认识和改造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中，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具有最耀眼的外在形式。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在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中，存在着一种直线变化和积累的原则。它反映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2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页。

③ 马克思说：“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并非“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0、130页。

在生产、技术效率和功能理性的观念上——而这些规则在资源利用中，在社会特定价值体系中引导着我们。在人越来越不依赖自然这一层意义上，他已拥有建设他所向往的那种社会的手段。”^① 在人类现代社会的今天，人与自然的關係中人所具有的控制自然的能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这并不是人类物质和技术发展的顶点，并不是人类在更深层次上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力实现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的理想状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仍将继续向前发展，朝着一个相互关系更协调，更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目标的方向变化。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持续的没有终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手段的发展、技术和经济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创造仍将遵循“一种直线的变化和积累的原则”继续发展。引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的一段话来表达人类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无限前景是非常恰当的，他说：“谁能对今后在发现、发明和改进方面设定限度呢？”^② 丹尼尔·贝尔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后人类在物质和技术发展上所获得的能力和前景时说到：随着“宗教冲击力”的耗散和“经济冲动力”的增强，“资本主义因其旺盛生命力获得了自己的特性——这就是它的无限发展性。在技术强有力的推动下，没有一种数学上的渐进线来限定它的指数发展。毫无局限。无比神圣。变化就是常规。”^③ 人类在物质和技术上获得的“无限发展性”改变了人与自然关系在传统社会中的一些基本特点。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变化的实质正如托尼（R.H. Tawney）所说，是“人对环境的驯服”。^④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 218 页。

② 转引自谭崇台：《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62 页。

③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 30 页。

④ 泰格、列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6 年，第 175 页。

然而，人类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获得发展的实质并不仅是，甚至不主要是“生产、技术效率和功能性”这些工具或手段上所取得的成果。现代化社会的最重要的发展实质是，人类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改进。现代化社会中，人类物质发展的全部成果，手段的能力和技术的水平都给人类自身的发展目标提供了全新的内容。人类现代发展的全部成就可以高度概括为人类首次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机遇，并且在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从本质上讲，这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人口指标作为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尚不能完整地反映现代社会发展的全部事实，但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体现了人类发展成就的最核心内容，其价值指向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本文力图论证的一个主题是：人口发展不能被作为统计指标来认识或只具统计意义，人口发展是人类刻意追求的、有内价值和意义的目标。

我确信人口发展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社会过程。无论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对社会发展成就的性质的判断和实质意义的认识都不能不在相应的人口发展中寻找其价值体现。人口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坐标，人口发展的性质和发展的程度，直接体现了人类实现终极目标需要满足的状况。

对于人口及人口发展的历史意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表达得十分清楚，“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① 在此，恩格斯着重强调两种生产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性，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页。

并未全面阐述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相互间作为手段与目标的关系问题。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剥削的最严厉的抨击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卫道士所标榜的完全相反，资本对利润和金钱的追逐从形式到结果都是对人性发展的泯灭。人性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中异化，完全悖离了人类发展目标。由此，他们设想并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人性获得彻底解放的大同世界。

因此，人口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程度的真实刻度，它表明作为终极价值目标的人类自身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价值意义，都应该在相应的人口发展中获得它的具体内容。对于特定历史时期人口发展的原因、性质及各种关系的解释的前提都来自于真实世界的历史背景。人口发展理论必须构架遮具有高度历史透视力的解释模型中，具有深厚历史基础和经验事实的现代化实践不可或缺。本文所考察的人口发展是人类现代化时期的历史现象，它要求我们的理论必须符合现代化过程和过程中各种关系的历史逻辑。人口现象的复杂性，以及解决人口问题的急迫性都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理论的发展。人口理论发展成为涉及众多学术领域，包容多种边缘学科和分支的独立的理论学科。人口学科重实证的方法和实践应用性，使人口理论始终具有浓厚的时代感和历史感。很多时候，这种时代感和历史感是非常沉重的（从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开始就一直背负着这一沉重的历史命运），人类在人口问题的实践和发展的前景中，摆脱不了对人类命运的担忧和疑惑。在现实生活中，人口发展最直接地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现实意义。人口理论不仅是我们的认识人口现象和规律，解决人口问题的有效工具，而且也应该是揭示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基本理论工具。人类在对发展问题的不断思索，对发展道路的反复实践中获得了一条逐渐清晰的发展思路，这就

是人口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在社会、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人类发展系统中，人口居于中心地位。人口中心论的意义，从社会发展系统中各子系统的功能和作用上理解，人口系统向所有其他系统输出物质能量（人力资源），同时也输出价值信息，规定和引导系统的运行方向和目标，即满足人类发展需要。

二、人类历史进程中人口的社会关系及其意义

在新发展理论的推动下，人口理论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由于我们有待于解释不断出现的新生人口问题，还因为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现象和人口发展规律并未了解透彻，现代人口发展从发展动力到运行机制并未得到系统的解释。现有的人口理论对现代社会变迁与人口发展关系的探讨，没有形成清晰的、连贯始终的因果关系和历史逻辑线索。我认为，这一人口理论的缺憾在于我们的人口理论缺乏制度分析手段，对实际发生重要作用的制度因素缺乏足够的思维敏感性。在建构人口分析模型时，我们对人类社会活动关系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更多地看重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物质成就，主要从经济技术发展的角度探索现代人口发展的动因，并以此来获得对人口行为的变化与发展的理解。忽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这一关系恰恰是理解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自我发展关系的关节点。过去的人口理论只注重了现代化时期人在新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实现了自我发展，忽视了在其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其中获得的能力和实现的发展，本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创新赋予了人类新的自然创造能力。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由与时代相适应的社会规范连接的，这种制约人的行为规范就是本文所指的制度。制度必然与人类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紧密相关，而且应最充分、最完整地体现在人际关系中。“一

种不同于人际联系与交往结构的制度，只是某一过去社会的化石而已”。^①现实的、有效的制度关系应当与实际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及交往结构保持一致。

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体现了人类物质财富的丰裕程度和技术水平所达到的高度。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人类社会在物质、技术上实现的发展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所谓现代化的开放性和无限性也是指人类社会的技术和物质发展所体现的“直线”增长和“积累”。早在 19 世纪中叶，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给予了高度的赞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现代化（其主要经济特征的工业化）是人类基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为增进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而做出的一种崭新的历史选择。它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的变化，即人类从消极地服从自然发展到更高层次的积极地改造和征服自然。

人的自我发展有多种认识层面。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自我发展的意识、能力以及发展的空间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实践着自我发展的目标。杜威认为在现代民主政体中，民主“是同相互关联的个体相关，在此相互关联之中，每个人都同他人密切相联，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各自的生活更具独特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个体不是以外在和机械的方式存在，而是以质量上的特质和独一无二的个性证实着自我的存在，个体“蕴涵着一种形而上的不可通约的数学观，即每一存在都自我作证并为自身利益考虑”，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个人主义

^① 杜威：《新旧个人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页。

(individualism)、天赋权利以及具有严格的个人特征与价值观的道德，都是现代民主主义不可或缺的基础。在经济学上，“经济人”假设是自古典经济学以来正统经济理论的共设前提。“经济人”在自利动机驱使下，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早期的经济个人主义“寻求从法律的束缚下释放人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努力”。^①现代社会个性的扩张是对发端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变化的最好的也是最基本意义上的解释。当社会充满为每一个人提供的获利机会，而且个人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追逐利益和机会，去摆脱具有共同价值基础的传统人口行为的束缚时，传统社会以群体价值为导向，具有高度社会约束性的人口行为的特征，就被能较充分地体现个人价值和利益追求，并受合法权利保障的现代人口行为所代替。所以，人口发展是基于现代化背景下，人类对自身利益认识和追求，以及满足需求的手段和控制能力显著提高的结果。

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实质是制度关系。人类的任何行为，无论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还是个人利益的自我设定、自我满足都是限定在特定的制度关系之中的。离开了制度约束的个人，就等于剥离了人的社会性，成为完全孤立的自然个体。一种制度设置，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它既约束人们可能的违规行为和不合法手段，限制人们可能活动的空间，防止人们超越制度的边界；又保护人们的自由权利和对成就的追求，扩展人们活动的范围和提供机会。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只有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才具有良好秩序的保证。因此，制约人口活动及人口发展的制度，决不是只起约束作用的“紧箍咒”。现代化的实践结果证实，现代社会的制度环境提供了人口活动更宽泛的空间，更多的机会和更强的利益刺激。人口发展的多方面需求和满

杜威：《新旧个人主义》，第 12、22 页。

足需求的努力，既受制度的刺激，又得到制度相应的保护。

人类向自然索取生存与发展的手段，在制度环境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秩序、效率和行为结果的可预测性，个人则在自我目标设定中追逐利益与机会。个人是人类社会行为的逻辑起点，但“不受团体组织……约束在一起的个人只是些怪物”，^①个人不能在制度关系上保持真空状态。现实制度不能用以维护物质主义的价值体系，因为只有符合人性和道德目的的技术手段才是合理的。这也正是旧个人主义与新个人主义区别的要点，“只有通过控制性地利用业已掌握自然界物质力量的科学与技术之全部资源，我们才能获得一种新个人主义”。^②这里，杜威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人类的个人行为的发展（由旧个人主义到新个人主义）不在于他所掌握的物质能力，而在于人类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力，而对于这一点，只能在人类社会制度关系中寻找。没有制度约束和限制的人类物质能力，肯定不可能有效地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且完全可能背离人类的终极目标。

三、历史中的人口：要素及稀缺性变化

人力资源是社会生产中的投入要素，人力资源的多少，人力资源内含的经济价值的大小都直接影响特定人口发展道路的基本走向。要素稀缺性变化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中的长期趋势必然导致一种特定的人口发展模式。

康芒斯认为，在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初期，与洛克和魁奈的经济学起源相反，大卫·休谟把经济学的原则建立在“稀少”性上，而社会“公道”和“私有制”都起因于相对稀少性。在休谟的稀少性经济理论中，稀少性原则及冲突的结果既表现为自私自利，

^① 杜威：《新旧个人主义》第 87 页。

^② 同上书，第 93 页。

又表现为自我牺牲。因此，稀少性是诸如“诚实不欺、公平交易、平等竞争、合理地使用经济能力、机会均等……”等现代经济美德的基础。如果没有稀少性，人类一切为有效分配社会资源、保证平等、自由竞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都是多余的，毫无必要的。^① 康芒斯放弃了沿用亚当·斯密和约翰·洛克关于自然丰裕和神的恩惠的假设，而使“稀少性”成为经济学和法学上的一种普遍原则，^② 并由此构架他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马尔萨斯以自然“天生的稀少”取代斯密的“天赐丰裕”，从必然的人口过剩中引导出人类性格的“道德起源”。马尔萨斯是以人口的变化来量度自然资源的稀少性的，所以，“稀少性”原则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则。稀缺性资源的分配及选择是经济学研究对象中一个沿用广泛的概念。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目標之间进行分配”。^③ 因此，人口作为生产要素的稀少性是人口行为经济分析的必要前提。人口、劳动力资源是以其资源稀缺性进入经济分析框架中的，人口要素的稀缺性和稀缺程度是相对于其他资源的稀缺或丰裕程度而言的。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化，是诱致性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动力（另一个是经营规模的变化）^④ 诺思关于经济史的制度变迁分析理论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他把人类历史中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压力视为经济史的核心问题，人口与资源压力导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并由此产生新的制度变迁

①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70—173页。

② 同上书，第173—174页。

③ 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

④ L. E. 戴维斯、D. C. 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载于 R.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6页。

的要求，在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形成人类行为和行为决定因素的长期变动的历史过程。诺思根据人类历史中由于人口与资源的变化而推动的社会变迁的性质，把人类历史中经济发展划分为两大经济革命。两次经济革命（原始狩猎采集到农业种植业，农业到工业）都得益于人口增长产生的对社会变迁的推力。只是，第二次经济革命“使当人口增长时自然资源的收益递减未构成威胁和变成事实”。^①

资源要素的稀缺性是指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需要相比较的相对稀缺性。人口增长及人口需求变化、资源基数及相对于技术条件的变化导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要使这种变化成为社会发展的长久稳定的基础，就必须，也必然相应地调整经济结构、变更产权关系、创新制度以使日益稀缺的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长久影响主要是：在经济上，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稀缺性增加，人类一直朝着形成排他性、竞争性所有制和可转让性权利的方向而努力，并由此导致人类历史不同阶段经济制度的转变；在政治上，国家取代其他社会组织成为界定产权和实施产权的单位；在个人发展上，基于人性自由、个人价值、公平竞争的人文精神逐渐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相应的保护，人的经济价值由此而不断得到提高。

构建人口发展理论框架的重要经验基础是：现代化的发展必将导致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及前途的新的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的经济效应是通过生产要素相对重要性变动而引起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形成的。在现代社会，新的利益源和发展机会对人口行为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影响，这就是它极大地提高了人的

^① D. 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经济价值，而“人的经济价值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①对应于人的相对价格提高的变化，制度变迁为抬高了“身价”的人口提供了满足新的利益需要的机会和效率、激励和秩序。人口发展（数量、质量、结构变动）正是人们在新的制度条件的激励下，寻求更高效率和经济价值的有序竞争中实现的。没有制度变迁提供的激励因素和机会，没有一定制度环境产生的有秩序竞争条件和规范，没有制度对人们努力和收益的有效保护，并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行为结果，现代人口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因此，不以上述制度因素的多方面作用来作解释工具，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现代人口发展的动因、性质和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并不仅仅把制度变迁理论当做一种只具理论意义的分析工具，而是力图通过这一分析线索再现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关键的、不可忽略的历史情景。在其中，我们会获得有利于人口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新的启示。

第三节 人口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都可以分为理论科学和政策科学。布罗姆利在阐述经济学的理论科学和政策科学的区别时认为，经济学的理论科学的目的是要建立准确地“塑造人类的相互关系”的理论，经济学的政策科学是“去发现个人和集体的要求（或需求）以使它们能更好地实现他们的目标”。^②我认为，这里所表达的经济学科的理论政策目标和关系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任

① T. W. 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于 R.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1页。

② D. W.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7页。

何社会学科，理论与政策都应具有价值目标上的内在一致性。

人口学的理论科学旨在探索人口行为的各种关系，指出其关系的性质和运行的规律。人口学的政策科学的实践意义是发现和满足人类人口行为的客观需求，使人类能最有效地实现人口发展目标。因此，人口学的理论学科和政策学科在价值目标上是一致的。理论思维的逻辑也应该从这两个认识角度串联各种关系，以获得比较清晰的从理论到实践的线索。

一、人口实践的探索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现象的复杂性，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人口和社会问题，都使得人口问题的解决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应给予优先考虑的战略措施。人口发展滞后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和发展需求，人口因素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因素，人口问题加重了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其他主要社会问题诸如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多种问题的难度。很自然地，人口状况及变化就不能不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现代历史及现实各种社会关系的钥匙；人口问题的解决就不能不成为解决多种社会主要问题的先决条件。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及人口理论的实践意义在此都表露无遗，这也是近二十余年来中国人口发展政策和战略措施的认识基础和思想基础。同时，这一认识人口现象和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已经转变为具有高度实践效率的政策体系和实际操作系统。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发展战略具有法律效力；在实践中，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具有一套有效运转的行政组织系统。很显然，人口问题的重要性上至国家政策决策者层，下至基层群众都已经被约束在有较高认识一致性的同一政策框架内，人口发展对我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在认识和实践上都是十分明了的。但是，认识人口问题的思路和解决人口问题的实践只到这一步是不够的。因为，这一步